

国家教育部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九五”研究基金项目

二十世纪

中外文学交流史

(下)

李 岫 秦林芳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I109.5/21

二十世纪 中外文学交流史 (下)

李岫 秦林芳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1 第一编 二十世纪前夜的中外文学交流

- | | |
|----|---------------------|
| 3 | 第一章 外来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 |
| 5 | 第一节 王韬的外游及其思想发展 |
| 9 | 第二节 “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 |
| 12 | 第三节 林译小说 |
| 18 | 第四节 政治小说的东渐 |
| 27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传入中国 |
| 34 | 第六节 王国维学术研究的西方背景 |
| 43 | 第七节 梁启超与“三界革命” |
| 47 | 第八节 诗人外交家黄遵宪 |
| 52 | 第九节 诗僧翻译家苏曼殊 |
| 57 | 第十节 中国早期话剧的来源、派别及内容 |
| 64 | 第十一节 俄国文学大量传入中国 |
| 68 | 第二章 中国文学在近代的输出 |
| 68 | 第一节 概述 |
| 77 | 第二节 中国文学在英国 |
| 87 | 第三节 中国文学在法国 |
| 96 | 第四节 中国文学在俄国 |

106	第五节 中国文学在美国
115	第二编 二十世纪上叶的中外文学交流
117	第一章 外来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117	第一节 “五四”时期的崇洋与复古之争
125	第二节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入中国
130	第三节 西方象征派与中国现代诗坛
137	第四节 十四行体由欧洲向中国的转徙
159	第五节 日本白桦派与中国现代作家
164	第六节 日本新感觉派与中国现代文学
169	第七节 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
182	第八节 左翼文学主潮的形成与现实主义的深化
192	第二章 现代译坛、译家、团体及期刊
192	第一节 鲁迅——现代中外文学交流的开拓者
197	第二节 茅盾和《小说月报》的革新
201	第三节 郭沫若等和创造社的翻译倾向
206	第四节 未名社的翻译倾向及特点
210	第五节 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翻译实绩
214	第六节 《译文》、《世界文库》引来别国火种
218	第七节 “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223	第三章 外国作家、思想家与中国现代文学
223	第一节 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238	第二节 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文学
260	第三节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

289	第四节	弗洛伊德与中国现代文学
306	第五节	托洛茨基与中国现代文学
316	第六节	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学
335	第七节	佐藤春夫与中国现代文学
353	第四章	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各种体式的影响
353	第一节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与外来影响
372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新诗流变与外来影响
391	第三节	中国现代散文与外来影响
409	第四节	中国现代戏剧与外来影响
432	第五节	报告文学的产生、发展与外来影响
444	第六节	现代散文诗的产生与外来影响
454	第五章	现代儿童文学的外来影响
454	第一节	域外来风
456	第二节	输入火种：新的内容与题材
464	第三节	文体革新：横的借鉴与纵的传承
473	第六章	国外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
473	第一节	鲁迅研究在国外
489	第二节	茅盾研究在国外
503	第三节	郭沫若研究在国外
512	第四节	巴金研究在国外
518	第五节	老舍研究在国外
529	第六节	曹禺研究在国外
540	第七节	丁玲研究在国外

557 第三编 二十世纪下叶的中外文学交流

559 第一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中外文学交流

560 第一节 对前苏联文学的接受与交流

574 第二节 与欧美各国的文学交流

580 第三节 与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交流

590 第二章 中外作家、学者的交流

590 第一节 东方学的一代宗师季羨林

600 第二节 传达中国文化的灵魂
——中文英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

610 第三节 “丹麦国旗勋章”获得者叶君健

621 第四节 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中的吴宓、梁实秋、钱
钟书

649 第五节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笔下的中国

658 第六节 布莱希特“面向东方”的尝试

667 第七节 西方现代诗派与中国古诗

675 第八节 诗僧寒山与美国当代诗坛

682 第三章 “文革”十年的单向译介

686 第四章 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新时期文学

686 第一节 国际文化背景

693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

700 第三节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与变异

718 第四节 话剧探索与新诗潮

730 第五节 新时期中外文学的双向交流

742	第五章 当代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
743	第一节 俄苏儿童文学：50 年代的强势影响
748	第二节 西方儿童文学：全球意识中的东西对话
765	第三节 双向互动：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771	第六章 海外华文文学的对外交流
774	第一节 亚洲华文文学的对外交流
792	第二节 美洲华文文学的对外交流
795	第三节 欧洲华文文学的对外交流
798	第七章 台湾现代派文学与西方影响
801	第一节 台湾现代派诗歌与西方影响
818	第二节 台湾现代派小说与西方影响
834	第八章 香港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835	第一节 对外国文学的引进
840	第二节 外国小说对香港小说的影响
850	第三节 外国诗歌对香港诗歌的影响
858	第四节 外国话剧对香港话剧的影响
865	第五节 外国散文对香港散文的影响
872	第九章 文化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873	第一节 澳门多元的文化生态
876	第二节 澳门文学发展的历史驱动力
881	第三节 艰难跨越的文学分水岭
883	第四节 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
890	第五节 历史昭示未来

893	第十章 世纪末的景观——四大文学巨匠1999的相聚与对话
-----	------------------------------

900	编后记
-----	-----

李 岫 秦林芳

第一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中外文学交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以大规模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新时期。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六百多名著名作家、理论家、艺术家、翻译家云集北京，成为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毛泽东莅临大会发表了讲话，朱德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他提出文艺工作今后的具体任务，要求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去和人民大众结合，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品”。^①茅盾和周扬分别向大会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号召文艺工作者“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为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奋斗”。^②这

①②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次大会代表了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的胜利会师，从此，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投入了新的生活。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国际地位的确立与提高，外国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中国读者也渴望了解世界并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的翻译工作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文学的对外交流同样成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学交流的进程和其他文学进程一样，有过繁荣和成就，也有衰落和空白，有过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第一节 对前苏联文学的接受与交流

正如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为模式一样，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以苏联文学为范本。对苏联文学的接受首先表现在对其文学理论的接受上。1950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现译《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重申并强调了文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的观点。1951年，《文艺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的信》和联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的决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并加有编者按语。这些文章和文件无疑成为1951年至1952年全国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导性文件。

从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包括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的提法，文学的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文学的体裁与分类，文学的风格与流派，文学的鉴赏与批评等等，无一不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作为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的准则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列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而且被中国文艺界普遍接受并定为一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

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①后来，毛泽东又发展成“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1951年3月15日到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联第二届青年作家会议。会上很多名作家都作了专题报告，其中一部分很快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几种报刊上：法捷耶夫的《作家的劳动》，发表在3月24日《光明日报》及《文艺报》3卷11期；戈尔巴托夫的《生活与作品》，发表在《文艺报》4卷1期；包哥廷的《论苏联创作问题与青年剧作家》，发表在《人民戏剧》3卷1期；爱伦堡的《作家与生活》，发表在4月21日的《光明日报》；裴定的《作家的技巧》，发表在5月5日的《光明日报》。这些报告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对于当时的青年作者，都曾起过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苏联作家指出，艺术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艰苦的、长期的劳动。艺术上的真正创造，不是模仿、抄袭，而是不断的钻研，不断的劳动，不断的创新。他们抨击了创作中的形式主义。他们认为，只有深入生活并在语言上下功夫，才能使读者对于作家所创造的东西引起完整的诗的印象。枯燥无力、支离破碎，陈词滥调的语言是会破坏艺术的效果和完整性的。苏联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引起了我国文艺界的重视。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文中严肃批判了“不好好研究祖国语言”，“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甚至“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才懂得的词”的现象，并进而提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1952年第1号《文艺报》发表了刘辽逸翻译的苏联《文学报》的专论《文学语言中的几个问题》。译文的前面加了“编者按”，指出：

①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在《文艺报》四卷中，曾展开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说明：如何从祖国的语言宝库中吸取文学语言，文学作家应如何学习准确地使用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等问题，已逐渐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关心和重视。

这里所发表的苏联《文学报》专论《文学语言中的几个问题》，是苏联文学界以及读者讨论语言问题的一个总结。论文根据斯大林的语言学说，对于文学语言与作品的思想内容，文学语言与人民口语的关系等重要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正确、精确的论述。

论文指出：丰富文学语言，是为了求得更好地表现日益丰富多样的生活内容。为语言的丰富而斗争，也就是为内容的丰富而斗争，在这样的论述中，论文规定了文学语言的美学原则。

论文强调指出：人民的语言是文学作家丰富自己的取之不尽的宝库。为了争取文学作品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反对语言的贫乏与单调，文学作家必须“倾听人民语言的声音”，使用全民语言的所有宝藏来丰富自己的语言。

论文对于文学语言的巨大教育作用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他应当为提高人民的语言文化而服务——作家不仅向人民学习语言，而且应当教人民以语言。

在论及如何在作品中运用古字、方言、土语、俗语、技术名词、新词等的时候，论文批判了那种在作品中运用早已淘汰的古字，或以拟古的风格表现现代生活、运用难懂的技术名词、不适当地堆砌方言、脱离语言传统而臆造新词等不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这篇论文对于我们丰富与发展文学语言，争取祖国语言的健康和纯洁，都是很有帮助的。

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曾于1952年撰文，号召我们以苏联为榜样，

学习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冯雪峰说：“我们学习苏联不仅指最先进的科学与技术，同样指最先进的苏联的文学与艺术。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从我们的先导者鲁迅以来，已经逐步走上一条共同的创作的道路。毛泽东指示给我们的方向，是马列主义的文艺方向，也正相同于苏联同志的方向，正是这方面招引我们去为人民的远大前途服务，以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伟大的民族的和人类的文化。在三十五年发展的过程中，列宁的每一个指示，斯大林的每一个指示，联共党中央的每一个指示，都使苏联文学艺术前进了一步。所以，无论从现实的基础或文艺的任务出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我们文艺的康庄大道。为了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学习马列主义和斯大林的近著，学习列宁、斯大林和联共党中央对文学艺术的指示，是重要的保证”。^①

苏联《共产党人》1952年第21期发表专论《苏联文学的当前任务》，文章切中时弊，指出了苏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文艺报》1953年第2号发表了蒋路的译文，希望引起中国广大作家的注意，为年轻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设立一个参照物。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文学艺术落后于现实，不能满足人民的高度和列宁、斯大林党给他们培养出来的美学趣味。沸腾的社会被描写得毫无生气，索然乏味，出现了平庸的、灰色的作品，甚至是粗制滥造的歪曲苏联社会现实的作品。二、应当把英雄人物描写得更加伟大而鲜明，这不仅是对生活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有它的假想。三、避免公式主义。作家应敢于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善于运用批评。不但正面事物应当成为典型化的对象，现实中的反面人物也应典型化，而且在显示新事物的胜利时，作家不应该低估敌对的旧事物的力量。四、改善出版工作，提高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和印刷形式的质量，杜绝粗制滥造的书籍。

① 冯雪峰：《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的先进经验》，《文艺报》1952年第21期。

1953年初苏联《新世界》杂志刊载了B·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部，作品中的失当引起苏联文学界的批评和讨论。《真理报》、《共产党人》及其他重要刊物都发表批评文章，所有批评涉及到格罗斯曼的思想和创作方法被认为是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1953年第7期的《文艺报》对此次批评和讨论做了专门报道。文章主要批评格罗斯曼的作品中人物与事件互不关联，为了写出史诗来，竭力把小说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最大限度，这样一来，整部小说失去平衡，结构松散而零乱。特别严厉批评了格罗斯曼对他发表的公正的批评意见采取了轻视态度。当然，文末也对格罗斯曼提出希望，即对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检讨错误的思想。转载并报道这次批评，目的是使中国的文艺界也能掌握正确的批评标准。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决议，为普遍地巩固集体农庄，在短时间内消灭部分集体农庄的落后，进一步发展所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和文化奠定了基础。此后，在1954年、1955年两次讨论了巩固和提高农业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我国也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逐步走向高潮的过程中，为了使广大农民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集体化“是人民群众深刻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①文艺界曾要求作家学习苏联的文学艺术经验，努力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作家要热爱生活，应大胆迎着复杂尖锐的生活矛盾走过去，既要表现先进力量与落后力量的斗争，又要写出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为了让中国作家进一步扩大文学视野，《文艺报》在1955年第23号上专门发表了奥维奇金在全苏描写集体农庄生活的作家会议上的报告，为中国作家提供借鉴。

其次，表现在中国和苏联作家的互访及中苏作品互译上。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苏联文学家、艺术家就在莫斯科举行过几次介绍中国新艺术作品的晚会，规模较大的一次是1949年

①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886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2月13日在苏联艺术工作者大厦举行的庆祝中国解放的晚会。苏联作家西蒙诺夫作了《中国印象记》的报告。当著名的诗歌朗诵者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尤飞·波斯德烈姆朗诵译成俄文的毛泽东的《长征》等诗时,全场不断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年老的译诗专家佛列吉尔朗诵了萧三的《诗人与儿子》等诗。许多书店和图书馆都有中文的和译成俄文的书,如柯仲平的《无敌民兵》,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周扬的《表现群众的时代》,杜烽的《李国瑞》,艾青、江丰合编的《西北剪纸集》等。莫斯科广播电台也向全世界播送译成俄文的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斯大林七十寿辰和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时,广播里也朗诵了中国的诗歌;二月红军节时朗诵了贺敬之的《致英雄的红军》;三月朗诵了发表在莫斯科晚报上的鲁藜的短诗《中国人民胜利之歌》和发表在《火星画报》上的田间的长诗《赶车传》中的一节。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文协邀请法捷耶夫与中国作家座谈文学创作。法捷耶夫由苏联驻华大使罗果夫与萧三陪同,中国作家到会的有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胡风、柯仲平、冯乃超、俞平伯、赵树理、冯雪峰、曹靖华、黄药眠、巴金、周立波、田间、艾青、冯至、钟敬文、刘白羽、何其芳、陈企霞等。

大家首先就如何把思想、生活、政策与艺术表现相结合的问题请教法捷耶夫,他谈了自己的创作体会。在怎样描写人物的问题上,法捷耶夫认为,有很多人是想像的,但主要人物都是现实的,他们的性格是根据实际而加以典型化了的。他说,写新人物就得照着他们的生活写,这在今日中国已有很好的条件,但重要的是应该看到他们的发展,发展的前途要着重写。法捷耶夫在回答“中国文学的道路”时说,每一个国家文学的发展,都是有它自己的道路。根据他所看到的文献,他认为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学的道路,是已经指明了方向的。在座谈中,法捷耶夫也曾谈到他们把各国作品译成俄文的经验。他们的翻译工作有三种人参加:第一种是精通两国文字而且具备相当文化程度的人,由他们先把各国作品直译成俄文。其次是请一些作家来修饰直译的作品,使其成为艺术品。最后由原作者本人或有才能的作家校

对一次。他恳切地希望得到中国作家的帮助，把中文多译成俄文，由俄文再翻成别的外文就比较容易了，中国作品也就更容易传布到全世界。座谈中，法捷耶夫也提出一些诸如文学遗产问题，旧文学里的完整形式如何运用到新文学中来，中国文学中哪一种形式比较发达等问题，对于这些，中国作家都给予简要的答复。

1951年9月19日下午，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应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邀请，在北京饭店和二百多位中国作家聚会，交换文学创作方面的意见。爱伦堡说，有生活才能有创作，写作不能从数量上着眼，要有高的质量。在回答如何培养青年作家这个问题时，他说青年作家很难从学校里培养，最好的办法就是生活。聂鲁达强调诗歌的斗争性。他认为诗人的责任是斗争，诗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对于能使自己的诗丰富起来的外来因素不要拒绝，诗歌要有诗的美，掌握能使自己的诗美化的技巧，对于敌人，这种武器就更有力量。他又热情地劝告中国的诗人不要忽视悠久历史的伟大传统，在这些宝贵的遗产中，是具有优美的特质的。

1953年7月19日是苏联著名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六十诞辰。中国诗坛为纪念这位天才诗人特于6月22日在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和文艺报编辑部的主持下，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田间、袁水拍、王亚平、黄药眠、吕剑、丘琴、余振等。与会者一致称赞了马雅科夫斯基的伟大成就，认为在马雅科夫斯基的诗歌中充满了无产阶级雄伟的气魄，他的作品中深刻地体现着党的思想，他的全部思想、感情、生活都与无产阶级事业紧密结合，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并非只是题材或主题很好，主要是他直接与人民群众的各种活动紧密联系着，因此即使写传单、广告，也都充满着共产主义的激情，而这通常是我们的诗人所缺乏的。再者，他诗中表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巨大的政治热情是我们应该学习、吸收和发扬的。学习马雅科夫斯基不是学习他形式上的排列，他继承并发扬古典文学传统，从民间和社会主义生活中吸收活的语言成分以及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

1954年6月初，中国作家张光年、阳翰笙、方纪、柯仲平等组团访问苏联。他们向苏联作家波列伏依、西蒙诺夫、斯坦因、斯切巴巧夫等提出有关如何在艺术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中创造典型的问题，苏联的抒情诗问题，发展讽刺和幽默作品问题等，双方就此交换了意见。

1955年3月7日，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和华西列夫斯卡娅应邀访问中国，与茅盾、老舍、刘白羽、曹禺等会谈两个半小时。他们询问了中国文艺界的最新情况，介绍了苏联文艺界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经验，指出了对不同错误思想的不同态度及目前文学工作者中的弱点，批评了教条主义无视作品表现的重要生活内容。

1955年10月，以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诗人苏尔科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进行访问。10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邀请苏尔科夫为首都文艺界作报告。这次报告传达了中苏两国人民间的伟大友谊，鼓舞了中国的作家。苏尔科夫说，苏联文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过去根本没有解决过的，那就是要表现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成了国家的主人。苏联文学在三十八年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非常复杂的道路，在这条路上，积累了很多经验，这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将多少会有帮助。当时中国正披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年6月13日的苏联《真理报》用半个版面发表了驻京记者对此事的报道，并指出“反革命集团”的被破获“功绩在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发挥了显著作用”。苏尔科夫针对这件事说：“这种情况和我们二三十年代的历史非常相似，在二十年前，我们在政治上破获了叛徒、反革命托洛茨基集团，他们是想出卖我们的国家。在文学界，他们装的好像是保护作家和艺术家个人创作上的自由，而偷偷地把与人民生活不相关的论调送给文学家，并以此来抗拒客观法则，但他们被驱逐出去了。我们的文学正是在和这些东西的斗争中成长巩固起来的。”苏尔科夫在这里特别指出：“每当我们需要找到明确的立场前进时，苏联共产党总是时刻给予了我们必要的帮助。”他听到胡风，就想起了苏联文艺界熟悉的卢卡契和李弗希茨，